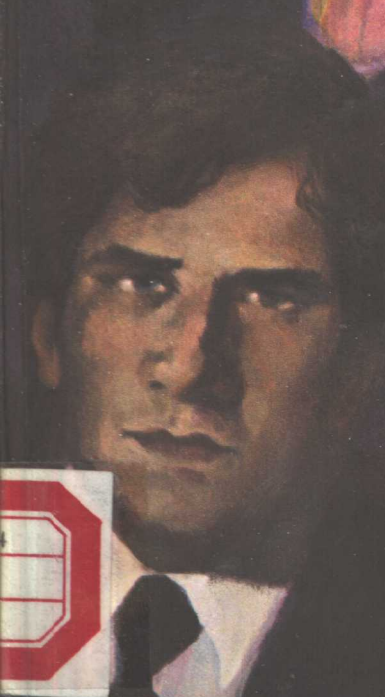


小风波

〔保加利亚〕斯塔玛托夫 著
江荣春 译



15044
3
1

030388

〔保加利亚〕斯塔玛托夫 著
江荣春 译

小风波



女子学院 0055452

小 风 波

〔保〕斯达玛托夫 著

江荣春 译

*

漓江出版社出版

（广西桂林市铁西小区）

广西新华书店发行 广西民族印刷厂印刷

*

开本 787×1092 1/32 印张 12.625 插页 2 字数 262000

1987年11月第1版 1987年11月第1次印刷

印 数 1—4000 册

ISBN 7-5407-0188-9/I·146

统一书号：10256·325 定价：2.20 元

• 译者前言 •

斯塔玛托夫及其创作

江荣春

在保加利亚近代文学发展史上，有一位杰出的现实主义作家，他和另一位作家耶林—彼林被公认是有着保加利亚的“活的历史”之称的伊凡·瓦佐夫（1850——1921）所开创的现实主义传统的优秀继承者。这位作家便是格·波·斯塔玛托夫。对于我国文艺界和广大读者来说，瓦佐夫的名字是比较熟识的，而斯塔玛托夫至今却仍颇为陌生。

格·波·斯塔玛托夫于1869年5月25日生在俄国蒂拉斯波尔市一个保加利亚的官僚家庭。那正是土耳其封建统治已经在保加利亚接近解体，资本主义经济关系开始发展的年代。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促进了民族解放运动的高涨。六十年代初，保加利亚出现了代表着农民和手工业者利益的著名革命家格·拉科夫斯基领导的反抗土耳其压迫者的武装斗争。其后，有瓦西里·列夫斯基领导的规模巨大的民族民主解放运动。1873年，列夫斯基殉难，赫里斯托·波捷夫被革命者拥戴为领袖，领导着全国起义运动。后来起义遭到土耳其军队的残酷镇压，波捷夫也于1867年在一次战役中英勇捐

躯。由于人民群众的长期反抗，起义起伏此起，保加利亚1878年从土耳其羁绊下获得解放，终于结束了从十四世纪末以来长达近五百年之久的外族统治。

早在俄国读中学时，斯塔玛托夫就崇敬民族英雄列夫斯基和波捷夫，从他们那里接受了民主主义思想的影响。列夫斯基是保加利亚大规模的民族民主革命组织的创始者，他毕生志在把保加利亚从土耳其的政治经济枷锁下和希腊僧侣的宗教羁绊下解放出来，他后来的被捕和殉难给了少年斯塔玛托夫的心灵以强烈震动。波捷夫对斯塔玛托夫的影响则更为深远，这位杰出的革命领袖同时又是著名的政论作家和抒情诗人，他的政治观点和哲学思想是在俄国革命民主主义思想家车尔尼雪夫斯基、赫尔岑、皮萨列夫等人的影响下形成的；在文学上，他极其推崇车尔尼雪夫斯基，车氏的《怎么办》是波捷夫最为珍爱的经典。波捷夫的政论和诗歌无情地抨击了异族统治者和国内地主富农对人民的压榨，特别是热烈歌颂了为民族自由独立而战的勇士们的事迹，充满了强烈的爱国主义和民主主义思想。总之，十九世纪反对土耳其奴役的民族解放运动的高涨和人民群众反对封建统治的斗争，决定了保加利亚民族文学的发展；七十年代的人民起义（1876年）和民族解放（1878年）推动了民族文学的进一步发展，决定着未来的作家斯塔玛托夫成长的轨迹。基本上与斯塔玛托夫同时的瓦佐夫的诗歌和小说，对他更是产生了直接的、明显的影响。

祖国获得独立以后，斯塔玛托夫的父亲结束了在俄国的寄寓生涯。1882年，十多岁的斯塔玛托夫第一次踏上了自己的国土。父亲回国以后出任政府要职，政界上层人物常在他

家聚会，他们之中，不少人官运亨通，贪得无厌，对上阿谀逢迎，对下欺压逞威。回国以后的现实景象使斯塔玛托夫大失所望。

不久，斯塔玛托夫秉承父意，违心地进了军事学校。艰苦的军队生活，辱没人格的练兵活动，加深了他对资本主义社会的憎恨，以致使他后来对整个资本主义社会持否定态度。但另一方面，军事生活倒也有助于他熟悉士兵，了解下层，使他从中看到了劳动者和统治者之间存在着不可逾越的鸿沟，看到了阶级的对立。尔后亲德派上台，政府开始迫害亲俄派，斯塔玛托夫的父亲失宠被黜，再度远走俄国；接着儿子也宣布“自愿退伍”。从此，斯塔玛托夫便变成了一无所有的穷人，遭受着贫困生活的煎熬，直到悄悄地离开人世。

斯塔玛托夫自幼聪慧好学，酷爱诗文。在军中服役期间，阅读了大量的俄罗斯文学和西欧文学的名著，果戈理和萨尔蒂柯夫—谢德林的讽刺作品，尤其使他倾倒。1891年，二十二岁的斯塔玛托夫在瓦佐夫主编的《朝霞》诗刊上初露头角，但他很快发现自己并无诗才。1893年，他上了大学的法学系，课余写作散文。1894年，在《思想》杂志上发表第一个短篇小说，广大读者为他的讽刺才能所吸引。从此，这位青年作者的姓名常常在该杂志上老作家的名字中间出现了。发表于1898年的《悠闲生活》展现了保加利亚上层社会的一角：富商格里拉诺夫决心以每月四百利瓦的投资，花九年工夫让儿子出国留学，以便使他成为“未来的部长”和“光耀门庭的达官贵人”；把女儿则嫁给一个中校，让她做有钱有势的军官太太。恋爱、婚姻、知识在他眼中都是商品，都可以用来做投机买卖。父亲的贪得无厌，儿女们的空虚无能，都

在作品里得到了淋漓尽致的表现。写于同年的《野游》把镜头摇向了作家最为熟悉的军队，展现了军官太太们的饱食终日，空虚无聊的生活。一大群有着特殊身份的俗物及其醉生梦死，放荡不羁的性格和勾心斗角，争风吃醋的丑态跃然纸上，真是一幅绝妙的讽刺画。字里行间流露出作者对于现实生活中那些自称“有理想、有抱负”的“理想家”，而实则置国家民族命运于不顾的现役军官的憎恶和对于祖国前途的隐忧。

《思想》杂志最初持自由主义的政治态度，斯塔玛托夫同它保持了合作关系；后来它转向反动，便导致了他们之间的不可避免的分裂。1899年所作的短篇《勤务兵计莫》，是他在该杂志上发表的最后一篇作品。小说通过对炮兵连下级士兵的悲惨命运的描写，暴露了军队的腐败，控诉了资本主义社会的罪恶。作品的题材和讽刺形象是作者在军事学校读书时就已初选，经过长期酝酿而形成的。它把旧军军官作为“穿着军官制服的人面兽心的东西”痛加鞭笞。中尉米罗维多夫是个“贪财鬼”，他对爱情的追求不过是对于“闪闪发亮的六万利瓦硬币”的追求的一种表现形式，在情场上一心盘算着的仍是“设法弄到现款”。请看他与卡济娜跳舞的一个场面吧：“他们俩贴得这么紧，以至她心跳的急剧撞击声都清晰可闻。他听着她那一下一下的心跳，仿佛是圆圆的金币一个接一个铿然有声地掉进他的口袋里。”小说在讽刺与鞭挞上层军官的同时，对于生活在底层的下级士兵倾注了满腔的同情。勤务兵计莫的形象是动人的。他和中尉、大尉之间的地位的对立是社会阶级对立的一个缩影。善良、忠厚的计莫虽然不是高大的艺术形象，但他的出现显然表明着作者提出对立

形象的意图。作者肯定了埋藏在计莫心底里的反抗的情绪，特别是赞扬了那个马其顿士兵对骑在他头上大施淫威的排长的报复行为。资产阶级评论界本来就对斯塔玛托夫嫉恨在心，现在看到这篇向资本主义世界挑战的小说更是按捺不住心头的怒火，《思想》编辑部立即宣布与他断绝关系。由此可见斯塔玛托夫现实主义小说的战斗力量之一斑了。

同是揭露资本主义世界的罪恶，两年之后发表的《在鼠洞里》将矛头由军界转向了政界。作品描写了两个“不幸的小官吏”在政府发布了一道撤销机关、解雇职员命令之后引起的一场虚惊，抨击了官僚社会的腐朽和黑暗。两个小官吏面临解职之虞引起的嫉恨和互相间展开的一场激烈的心理战，以及虚惊之后又如何忽然成为形影不离的“孪生官”，描写得活龙活现。他们在虚惊之后得出的教训是：“往后我们要尽量少去那些滑头、政客出没的咖啡馆，不要随便露面。就这样平平安安混到晚年，到时就退休。”在结尾处，作者用他擅长的讽刺笔墨写道：“他们发誓要做个沉默的人，除非上司问及，绝不发表任何议论。就这样，他们慢慢地把复杂的话给忘了，不久，连国语也忘了一半。……他们的希望只有一个：千万不要让世人想起他们。”就在这样一些平淡的描写里，喷射着焚烧资本主义官僚社会的火焰。

1901年大学毕业之后，斯塔玛托夫在司法机关供职，直至1921年。二十年间，他广泛接触社会各阶层，仔细研究种种“社会相”，小说创作有了很大的发展。

《两个天才》（1910年）展现了随着资本主义社会的发展，精神文明与物质文明的分离趋势，写出了社会经济力量对社会道德观念的腐蚀作用。

“天才的骗子”李诺夫斯基原是个流浪儿，打过杂，做过工，在冷酷的社会里，他的自私和残忍恶性膨胀：“只要法律允许的话，我什么事都干得出来。”他认为卑鄙就是天才，有钱就是有德，因此他不择手段地“把能力变为金钱”。在他身上已失去了任何人性的东西。

那么“天才的作家”伊尔莫夫呢？他开始与“天才的骗子”是有距离的，他想塑造一些高尚的人物形象来教育人们，改变社会风气，但他经受不了这种社会力量的腐蚀。在“拯救”社会失败之后，他那隐藏的虚伪便开始潜滋暗长。他羡慕老同学家里豪华阔气，妻子年轻美丽，抱怨自己的书房太简陋，妻子也“不如从前那样美丽可爱”了。他闷闷不乐，对热情的妻子冷冰冰的。难怪李诺夫斯基把伊尔莫夫称作和他一样的天才哩！“一个是天才的骗子，一个是天才的作家。”

总之，作者在这个短篇里，辛辣地讽刺了两个“天才”，批判了资本主义社会对人性的腐蚀和歪曲，从而给予了拜金狂、饕餮狂和整个资本主义社会制度以彻底的否定。

十年之后的《小风波》（1920年）在斯塔玛托夫的现实主义创作中是很有代表性的一篇，它曾引起国内外读者的特别重视。他的第一个中短篇小说集的俄译本便以本篇作为书名。小说以第一次世界大战后保加利亚仍被异国侵略军占领并面临着签订丧权辱国和约这样的痛苦事实为背景，通过出征三年的卫国战士回国后在家庭里引起的一场“小风波”动人地描写了一个忠诚的爱国者的悲剧。主人公阿巴洛夫大尉在意大利前线被俘，备受凌辱之后回到了离别三年的索非亚，出乎他的意料：人们已经忘记了战争、耻辱和仇敌，“民

族的尊严”、“人民的荣誉”这些曾经使土耳其统治时期的波捷夫、列夫斯基心往神驰的神圣字眼，而今变成了“过时的概念”。外国侵略军军官不仅可以在保加利亚的首都为所欲为，而且保加利亚军官见了他们还要举手致敬，这竟然是政府的明文规定！这种变化对于有着强烈的民族自尊心的主人公是极大的刺激。小说把社会上的这种变化集中到阿巴洛夫的家庭里给以典型的表现：曾经也是爱国者的父亲现在干起投机倒把买卖来，成了令人瞩目的阔佬；弟弟也当上了经理；妹妹的情人是意大利侵略军的军官，这个外国公爵竟成了全家最宠爱的上宾；一家人都心安理得地过着豪华的生活，而曾经被全家引为骄傲的精神支柱——过世的老祖父的遗像，现在被丢弃到了杂屋一隅的破麻袋里。——这就是阿巴洛夫看到的“新保加利亚”！这种“新”的生活引起了他的沉思：“不可战胜的德国连同它的神话般的兴登堡元帅被击败了，奥地利和土耳其也逃脱不了同样的命运，为什么我国的土地上至今还是异邦人在寻欢作乐呢？”原来，“这儿的一切权力握在克列特廷将军（按：即第一次大战后法国在保占领军的总司令）手里。我们没有政权，社会民主党人和农盟成员只晓得狗咬狗”！阿巴洛夫精神极度苦痛；但甘做顺民的家人对他毫不理解，说他“身患精神病”。他和“新保加利亚”之间没有妥协的余地，他牢记自己“是列夫斯基·波捷夫为之奋斗牺牲的保加利亚的最小的儿子”、“无权民族的儿子”。“他的保加利亚就要灭亡了。是不是会诞生一个他所不了解的新保加利亚呢？他不得而知。”在极度痛苦中，他终于举起手枪，完成了悲壮的一幕。这篇小说是斯塔玛托夫的痛苦心灵的记录；主人公的经历、思想和个性都带有作家本人

的痕迹。这种悲愤和痛苦在作者后期作品里常有反映。

与上述作品稍有不同，中篇《琶拉基尼》（1920年）以其极富抒情味的细腻的内心理刻画吸引着读者。声乐老教授皮耶得罗的形象很富感染力。他忠于艺术，为了崇高的事业，年青时战胜了失恋的苦痛；后来，也是为了崇高的事业，他不惜花费巨款“买学生来培养”；现在，当他发现自己悉心培育的“上帝”在美人醇酒的诱惑下逐渐堕落，以至无可救药的时候，他的唯一的希望破灭了。也还是为了捍卫神圣的艺术事业，他毅然决然地结束了自己的生命。皮耶得罗的思想性格正是作者本人的写照。

在另一个中篇《魏梁诺夫》（1922年）里，作者把批判的锋芒直接指向了资产阶级上层的党派之争。小资产阶级出身的魏梁诺夫从穷乡僻壤来到京城，想方设法钻进了政府部门，谋了个月薪一百五十利瓦的小职员的位置。他凭着写作的才能和钻营的手段拼命挤进上流社会，用小说创作做本钱，不断捞到女人，并且卖身投靠资产阶级政党，充当党派斗争的工具。小说前面部分通过对两个次要人物的描写，批判了保加利亚社会上一味盲目乐观的和只知怨天尤人的两种知识分子。他们以哲学家自命，其实“都是保加利亚的奥勃洛莫夫”，于国家、民族毫无益处；后半部分逐渐深入到资产阶级社会上层党派间狗咬狗的争斗，显示出重大的社会意义。有的外国评论家指出这篇小说无论情节和人物，都与法国大作家莫泊桑的名篇《俊友》有相似之处，是有一定的道理的；但是各各有其本民族的现实生活的依据和艺术描写的特点。

斯玛塔托夫对资本主义上层社会的揭露和抨击是多方面的，除了上述种种，还有资本主义社会里最常见的社会问

题——恋爱、婚姻和家庭问题。短小精悍的《豪华的海滨别墅》选取金钱万能世界里的诱骗爱情的一组镜头，写成一篇讽刺意味深长的恶作剧，其主题思想绝妙地概括在开头引用的两行诗里：“主宰这个世界的是爱情，维护其尊严的却是黄金。”斯塔玛托夫还有好些作品谴责资本主义社会把妇女当做商品，把婚姻变成赤裸裸的现金交易的无耻行径，《奈尔查诺夫夫妇》（1927年）便是颇为突出的一篇。奈尔查诺夫是“商界最富经验的生意人”，在弱肉强食的竞争中，冒了种种风险去增长财富。在他眼里，人和物都是买卖的对象。他与一家皮货批发商做过几回生意，“其中有一回是用特种商品成交的，那就是魏洛尼卡——他的老婆。”这种金钱婚姻是对爱情的亵渎，夫妻之间当然没有感情可言。魏洛尼卡“在丈夫家过着舒适的生活，在另外的地方享受着爱情。”这种通过描写没有爱情的商品婚姻来暴露资本主义罪恶制度的作品，在近代世界文学史上可说比比皆是，从这一点上说，本篇并非独创；但是，象所有优秀的批判现实主义作家那样，斯塔玛托夫的作品也植根于本民族的现实生活的土壤，题材的选取，主题的形成，人物的塑造，语言的锤炼，无一不打上自己民族的烙印。并且，作者能深入到人物的灵魂，揭示婚姻商品化的原因，比如，奈尔查诺夫从不以侵占和掠夺他人为耻，反认为“蜘蛛吃苍蝇，甲虫吃蜘蛛”这种弱肉强食的现象是天经地义的，只怪小甲虫无用。特别是小说将重点放在对巧取暴利、制造伪币的奈尔查诺夫怎样一次又一次地逃过法律的惩处的描写上，这就使读者不仅看到了商品婚姻的更深的社会背景，而且还看到了法律的虚伪性，作品的主题思想显然深化了。所有这些都反映出了斯塔玛托夫小说的

现实主义的深刻性。

斯塔玛托夫一生没有加入过任何党派，他早年竭力使自己的创作超然于政治斗争之外；然而，作为一个忧国忧民、追求民主、忠于现实生活的作家，是不可能游离于阶级斗争之外的，相反，他还有意“介入”上层的政治斗争，这个趋向越到后期越加明显。写于1927年，发表于1948年的《停泊》，是他的创作发展历程上一个新的可贵的标志。它择取的是作者不曾择取过的现实题材，写的是一个老共产党员，工运领袖在革命征途上感到疲倦、临阵脱逃、开始“停泊”的故事。作者对这种知识分子的蜕化提出了批判，对这种人的内心世界作了细致的剖析：他的忧虑、苦恼、矛盾不过说明他的虚伪；为了钱袋，他背叛了信仰，心甘情愿与曾经厌恶过的资产阶级“浑然一体”，做一个屈服于警察和宪兵的“和平公民”。更其难能可贵的是，小说出现了一个年青的排字工人，不屈的共产党员的形象；他的英勇坚强与意志薄弱、蜕化变质的斯卡洛夫形成了鲜明的对比。这篇小说的思想高度与社会意义，无疑是作者创作的高峰。

斯塔玛托夫一生处在资产阶级评论界的攻击下，身心受到摧残。这位忠于祖国、一生追求光明和进步的作家自从回到自己的故土后，一直有着异邦人的孤独感。他在日记里感叹道：“虽然我在保加利亚生活了四十五个冬春，当过军官、法官，成了作家……却感到孤苦伶仃，象个异邦人。”他一生勤奋，发表了两百来篇文学作品，其中影响最大的是《特写和短篇小说集》（1905年）、《特写集》（1915年）、《短篇小说集》（2卷，1929—1930年）、《花粉集》（1934年）、剧本《利古里亚人》（1910年）、《血和水》（1941年）等。尽管如此，他

大半生仍过着贫困的生活。由于长期的贫病交迫，于1942年11月9日在一家医院的大病房里含恨与世长辞。

纵观斯塔玛托夫的创作，我们不能不为他对现实生活的深刻观察和忠实描写所感动。他的作品从不追求复杂、离奇的情节，往往是在比较单纯的故事描写中展现社会面貌。他笔下的人物有血有肉，没有简单化的痕迹。他善于捕捉人物复杂的内心世界和在特定情况下的心理状态，进行逼真的、细腻地刻画。而这一切又总是与他的讽刺才能分不开。他的小说创作受着俄国果戈理和谢德林的影响，又形成了他自己的特色。《中国大百科全书》称他是一位“具有独特艺术风格的讽刺作家”（见该书954页）。

斯塔玛托夫一生塑造了各种人物形象，虽然正面形象不多，但在他心目中，普通的人民群众的地位是远远高出上层人物的。因此，上流社会的腐败与下层社会的不幸总是以对比的形式出现的。这样，他的作品爱国主义与人民性就取得了一致。还有，随着作者与人民群众、与政治斗争的联系加强，这不多的正面形象有了明显的发展。从计莫到阿巴洛夫到皮耶得罗一直到《停泊》中的工人形象，生动地表明了这个发展过程。这也正是作者本人的爱国主义、民主主义思想不断发展和社会主义思想影响不断加深的反映。

漓江出版社



目 录

斯塔玛托夫及其创作……………江荣春

悠闲生活……………（ 1 ）

野游……………（ 7 ）

勤务兵计莫……………（ 22 ）

我们的祖国……………（ 54 ）

在鼠洞里……………（ 57 ）

金柯·米赫夫……………（ 70 ）

两个天才……………（ 77 ）

琶拉基尼……………（101）

小风波……………（154）

魏梁诺夫……………（204）

奈尔查诺夫夫妇……………（261）

停泊·····	(284)
丽坦·德鲁干诺娃·····	(312)
小“娜娜”·····	(344)
漂泊艺人·····	(355)
丫头德拉卡·····	(366)
豪华的海滨别墅·····	(378)
小母亲·····	(386)